

引子

2014年至今,我国已迎接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。每次,当烈士的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陵园时,许多手持国旗、鲜花的群众自发来到街边,列队缅怀英烈。

“接英雄回家是使命,为烈士寻亲是传承。”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社会教育部部长王春婕说,“我和同事们时刻没有忘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”

交有关部门,通过查找档案、发动社会力量、进行DNA鉴定等,确定烈士身份,寻找烈士亲人。近年来,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,相关部门支持配合,社会各界广泛参与,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。

“搜寻发掘烈士遗骸、进行鉴定保护、为烈士寻亲……教育的是亿万后人,顺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情感,体现的是国家责任。”在国务院新闻办9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表示。

人民眼·传承红色基因

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为烈士寻亲活动——

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

本报记者 游 仪 胡婧怡 刘军国

线下寻找

整理遗物线索确定烈士身份,设立寻亲专员开展走访调查

拿起印章,用毛刷轻扫几下,将灰尘去除。摊开一张白纸,蘸印泥,按印章,眼看烈士鲜红的姓名在纸上呈现,王春婕抿紧嘴唇,神情庄重。

“印章是辨识志愿军烈士身份的重要信物。那个年代,许多战士与家人通信,会盖上的自己的印章。”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,指着烈士纪念馆中大大小小的印章,王春婕说。

每当有烈士遗物入库,王春婕和同事都会逐一测量、拍照、登记、造册,“每件遗物,都承载着一段历史,记录着一个崇高的鲜活生命。”

步入烈士遗物库房,恒温恒湿条件下,一个个无酸装具整齐排列,装具内是一件件标有001、002等数字编号的烈士遗物,或是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,或是一个布满弹孔的水壶……王春婕说,他们要在遗物整理过程中,尽可能发现、识别烈士的身份线索,希望找到烈士姓名,继而为烈士寻找亲人。

寻亲,是一场自发的双向奔赴。王春婕在找,烈士的家人也在寻。

2021年9月2日,年近百岁的吴玉成从家乡福建省闽侯县出发,跨越2000多公里,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在陵园烈士纪念馆,他从皮夹中抽出一张泛黄的2英寸塑封照片。照片上,少年面容青涩,身姿挺拔,身后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。照片背面,写有“兄奎,公元1952年5月15日,红星照相馆”的字样,并盖上了个人印章。

“一模一样!这就是照片背面的那枚印章,上面是我伯父吴雄奎的名字。”趴在纪念馆的玻璃橱窗内,仔细比对照片背面和橱窗内的印章字迹后,吴玉成难掩激动。

吴雄奎生前的照片,是他牺牲后经人邮寄到家里的。除此之外,吴玉成一家关于伯父的信息,仅有烈士证上的寥寥数字:1934年出生,志愿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,1953年7月,朝鲜,因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……

2020年9月,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王春婕在整理烈士遗物的过程中,发现了这枚刻有“吴雄奎”3个字的印章。2021年7月的一天,吴玉成接到村里电话:“吴雄奎烈士可能找到了,需要DNA比对验证。”很快,吴玉成和父亲一起,到县人民医院抽血。不久后,传来消息:DNA比对成功!

“整理烈士遗物时发现的线索,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给退役军人事务部,以便后续开展DNA比对等工作。”王春婕说,目前已为20位“归国”的在韩中国

人民志愿军烈士找到亲人。

同样找到烈士亲人的,还有生活在北京的毛常尧。2022年元宵节,当时已年近八旬的毛常尧和妻子一道,从北京来到四川巴中市南江烈士陵园,祭奠他的姑姑——红军烈士毛秀刚。毛常尧说,虽然从未见过姑姑,但从小就听她的故事,知道她是为革命而牺牲,“受姑姑影响,我早早便选择参军报国。”

前些年,毛常尧一家一直在寻找姑姑的安葬地点。帮老人圆了心愿的,是兼任寻亲专员的南江县烈士陵园管理局副局长王中立。这些年,他们也在为包括毛秀刚在内的陵园埋葬烈士寻找亲人。

查阅大量资料,多部门联系求证,多地走访调查,寻亲的过程很不容易。王中立辗转了解到,毛秀刚有个当过兵的侄子。这一发现,让他找到了突破口。

如今,像王中立一样的寻亲专员,巴中市有2200多人,包括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等。近年来,四川组建烈士纪念馆保护中心,配备寻亲专员,开展走访调查,2021年以来已为891位烈士找到亲人。

线上联动

利用信息技术,搭建寻亲平台,不放过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

约1000公里,是四川巴中到河南信阳的距离,也是陈自岗烈士与家的距离。

家住河南信阳的陈军,与父亲一道,接续寻亲八十五载。“过去每年祭祖,要给亲人上坟,我们不知道爷爷在哪,只能对着四川的方向,呼喊他的名字。”陈军说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翻阅有关资料,在网上检索爷爷的名字,成了陈军的生活习惯。随着时间推移,陈军渐渐感到希望渺茫。直到2018年7月,他在手机上收到一条弹窗消息:“烈士亲属您在哪儿?8位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葬在四川,静待家人。”

点进去,可以看到8位埋葬在四川的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信息,其中的“陈自刚”烈士,与爷爷的名字很相似。陈军听家人讲,爷爷牺牲在大石山,而这位烈士牺牲在大山。名字和牺牲地都只有一字之差!陈军心中升起希望,立即拨通了弹窗消息上的联系人电话。

没过多久,陈军收到回复:经比对烈士籍贯、战斗经历等信息,证实了“陈自刚”就是陈军的爷爷陈自岗。

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,长眠着2.5万余位红军烈士,其中无名烈士1.7万余位,有姓名的外省籍烈士218位。

“我们和媒体合作,根据墓碑信息,



查阅历史资料,多方核实比对后,利用地理位置弹窗等信息技术,将烈士姓名、生平等信息,推送给烈士家乡部分人群,帮助寻找烈士亲人。”负责陵园管理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旧址(巴中)管理局副局长薛元勋说。

临别,陈军从爷爷墓前取了一抔土,回到信阳后,撒在了自家的祖坟。1933年,20多岁的陈自岗跟随部队跋山涉水,行至四川万源时在战斗中牺牲。80多年后,烈士英魂终于荣归故里。

近年来,各地利用信息技术,搭建寻亲平台,提升烈士寻亲成功率。2021年,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。

“线上线下联动,不放过任何一条可能有用的信息。”薛元勋说,今年2月,通江县启动2024年“为烈士寻亲”活动前,县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县委党史研究室、县档案馆等部门工作人员齐聚一堂,商议首批烈士信息发布事宜。

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有处墓碑,碑上的烈士姓名为“陈修坤”,可据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》记载,籍贯、时间、事迹相一致的烈士名为“陈修坤”。有人认为信息出现矛盾,建议暂不发布,薛元勋提出异议。

“那个年代,像陈自岗烈士那样,一字之差的事情很常见,不能因此失去寻亲的机会。”在薛元勋提议下,今年3月,当地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的“为烈士寻亲”专项活动首批烈士信息中,陈修坤(坤)烈士的姓名被列入。

至今,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已为安葬在此的50位革命烈士找到亲人。

社会参与

政府支持,青年加入,组建志愿团队,汇聚寻亲合力

“打仗的时候,您害怕吗?”10多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85后浙江宁波姑娘孙嘉泽前去看望抗战老兵。眼见年过九旬的老兵双手布满老茧,身体患有残疾,她忍不住问。

“孩子,哪个人上战场不害怕?但是上不了的话,谁来保卫国家?”老人的话,让孙嘉泽深受震撼。此后,她一有空就到烈士陵园祭扫,还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图片和感受。

“我想让大家多来看看烈士,不要忘记他们。渐渐地,响应者越来越多。”孙嘉泽说。

黄军平是响应者之一。这名陕北农民,曾前往朝鲜寻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大伯。亲人尚未寻到,但当他来到开城市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,看到英烈墙上铭刻的上万名烈士姓名时,不由得想,“我在找我的亲人,他们的家人是不是也在找他们?”

回国后,黄军平找孙嘉泽商量,能否将这些烈士的资料整理出来,帮他们寻亲?

2017年,两人发起了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项目。

寻亲之路,遇到诸多困难。籍贯不详、部队番号不详、重名人数众多……孙嘉泽没有气馁,想出了“笨办法”。她在网上招募了20多名志愿者,先从一些烈士陵园拍摄的视频中截取烈士姓名信息,再与中华英烈网和各地相关英烈史料进行比对。

多年来,志愿团队走访了20多个省份、7个国家,收集整理4万多条烈士信息,形成包括姓名、出生年月、牺牲时间、牺牲地点、部队番号等详细信息的数据库。孙嘉泽将数据库同步提供给相关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士陵园,帮助完善烈士信息,以便更好地开展寻亲工作。

孙嘉泽说,党和政府对志愿团队工作的支持远不止于此。今年6月,团队在走访时得知,童云宝烈士的女儿在寻找父亲的安葬地点,几十年来未能如愿。后来,团队在有关部门帮助下,查阅、核对历史资料,多方走访比对,最终在位于河南睢县的睢杞战役烈士陵园,找到童云宝烈士的安葬地点。

“我们到各地寻亲,只要跟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打个招呼,他们就会帮我们和当地做好对接。”孙嘉泽说,她过去在一家私企上班。为支持她牵头的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项目,共青团宁波市海曙区委邀请她到区志愿者协会工作,并开设了“孙嘉泽青年工作室”,海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在资金配套、资料查找、联系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协同发力,汇聚力。在孙嘉泽影响下,已有400多名志愿者加入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项目,家住沈阳的95后姑娘金美燕是其中一员。

与孙嘉泽一样,金美燕每年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好多回,“平时路过也会进去看看。说是‘路过’,其实从她家到陵园,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。”

与孙嘉泽一样,每到一处烈士墓地,金美燕都会逐一记录相关信息,每当遇到祭扫的家属、老战士,她便上前搭话,“说不定能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更多烈士信息,补充进我们的寻亲数据库。”

尽管地域、年龄、职业不同,但因为相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。如今,金美燕和孙嘉泽成了好朋友,两人多次相约到烈士陵园祭扫,一同为烈士寻亲。

前不久,中央宣传部、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、全国双拥办评选出10位2023年“最美拥军人物”,孙嘉泽作为“倾力为烈士寻亲的爱心人士”上榜。在孙嘉泽发起成立的400多人志愿者寻亲团队中,40岁以下青年占到3/4,其中不乏90后、00后。

“一位位先烈,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,也是我们青年人眼中最亮的星。”孙嘉泽由衷地说。



红色传承 赓续精神血脉,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

坚持为烈士寻亲10多年,去过全国200多座烈士陵园,家住沈阳的杨宁,心底存有遗憾。

去年走访辽宁锦州凌海市烈士陵园,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陈光明墓碑上,“四川省中江县九区第四村,四十军三六七团战士”的碑文引起杨宁的注意:九区第四村在哪里?那里还有烈士的亲人吗?

几经了解,杨宁得知九区第四村,就是现在的四川中江县继光镇继光村。他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,得到对方的调查回复:因年代久远,陈光明烈士的亲人已经找不到了。

这样的遗憾,杨宁时常遇到,“早些年,很多烈士墓都是散墓,相关原始记录也不完整,为寻亲工作带来挑战。”杨宁的心底,也有温暖的慰藉。

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广场四周,是近200米长的烈士英名墙,按照姓氏笔画排序,197653位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镌刻其上。杨宁在上面找到了陈光明烈士的名字。

2014年,抗美援朝烈士英名墙落成,每天来这里献花、祭扫的人很多。杨宁感慨,“虽然还有很多烈士没有找到亲人,但是他们从未被遗忘。”

每到清明节,英名墙前常能见到一位老人,用手摩挲着“邢孝先”3个金色刻字,泪水涟涟。她叫邢桂芝,辽宁阜新新人。“邢孝先是我哥哥,1935年出生。1953年,在敌机一次轰炸中牺牲。”多年来,哥哥烈士证上的内容早已刻在那桂芝的脑海。

在那桂芝的记忆里,哥哥是位追求进步的青年,“去参军是他再三要求的。”虽然,邢桂芝至今不知道哥哥安葬在哪里,但她的内心是宽慰的:“英名墙,为我们提供了祭扫的场地和精神寄托,更让我感受到,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哥哥。”

2023年清明节,邢桂芝把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封哥哥的家书,捐赠给陵园,“希望英烈们的事迹和精神能鼓舞更多的人。”

有英名墙,也有无名墙、无名碑。水

娃子、幺女子……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,总长102米的英烈纪念馆墙上,镌刻着7823位烈士姓名,其中包括202位“娃子”、76位“女子”。

“‘娃子’‘女子’是我们当地人喊小辈的乳名,意味着他们都是红军小战士。”陵园讲解员彭香解释。

陵园内,还有一处无名烈士纪念馆。一排排如同军阵般的白色墓碑下,安葬着1.7万余位无名烈士,每座墓碑上,只镌刻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。“当年因为战事紧急,许多烈士散葬在大巴山,无碑无名。”薛元勋说,近些年,当地将散葬在全县50处的烈士遗骸迁葬到陵园,阔别多年的战士们这才“归队”。

今年7月,来自湖北孝感大悟县的黄有文带着妻子来到无名烈士纪念馆,祭奠他的曾祖父黄明文烈士。1932年底,黄明文在鹦哥嘴战斗中牺牲。多年来,黄有文和他的爷爷、父亲,几代人接力找寻,也没找到曾祖父的安葬地点。直到今年春天,他听当地村民说,他的曾祖父,可能迁葬到了纪念馆。

黄有文深信:他的曾祖父,一定就在这里,不会离开他的战友们;这里安葬的1.7万余位无名烈士,都是他的亲人。

秋日清晨,前来扫墓的王建刚拄着拐,儿子王君权背着篓,一人捡落叶,一人擦墓碑。王建刚的父亲是红军老战士王成现,已经过世。他们祖孙三代都在陵园附近居住,接续为烈士守墓80多年。王建刚说,这些年,有不少红军后代到无名碑前祭扫,“为烈士寻亲,寻的是血脉上的亲人,赓续的是精神血脉。”

历史记忆历久弥新,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。又到烈士纪念日前夕,烈士陵园内,无名碑前,祭扫的群众络绎不绝……

图①:今年清明期间,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小志愿者为烈士墓碑描红。

李梅摄

图②:王春婕(右)与同事整理烈士遗物。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供图

图③:孙嘉泽(左)看望志愿军老兵。谢好摄

图④:王建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清理杂草。程聪摄

本版责编:杨彦 孙振 戴林峰 版式设计:汪哲平

